

比较分析宗教在印巴两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作用

和红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时仅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贾露 东亚大学***

内容提要

印度半岛是世界上宗教历史最悠久的区域，宗教贯穿了从古印度到英属印度，再到后来印巴分治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热潮澎湃，再加上英属印度境内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对立不断激化，宗主国英国推出了《蒙巴顿方案》来承认穆斯林建立独立政权的权力，这最终导致印度于1950年正式构建了民族国家，紧接着1956年巴基斯坦构建了共和国。宗教因素对印巴两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以及对建国后的从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比较分析印度教对印度建国的作用和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建国的作用后，论证了宗教在印巴两国民族国家构建作用方面的相同点和差异性。本文发现了宗教是印巴两国构建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但在凝聚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宗教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了两国的国家政策和施政纲领；宗教还不同程度的强化了两国各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感。

关键词：宗教；印度；巴基斯坦；印巴分治；民族国家构建

I. 序论

古印度是世界上宗教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其初期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姜景奎, 2005)。古印度在不同时代和地区里，盛行了包括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各种宗教，这些宗教在历史长河对印度半岛的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开始盛行的是印度教，它的雏形始于吠陀时期，它用来表达印度农耕社会敬畏天象自然，并寄托于神灵和祖先来缓解自身对现实恶劣生产生活环境的无力感，随后宗教成为了统治者控制和维持国家统一的手段(Raj Pruthi 2004)。由于社会阶层没有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机会，社会阶层的固化也引发了中下阶层对教义和规范的批评和不满，由此逐渐兴起了“沙门思潮”(Samana)。在“沙门思潮”的宗教百家争鸣的思潮下，诞生了许多哲学思想家与新宗教，如悉达多·乔达摩创立的佛教、筏驮摩那创立的耆那教、富兰那·迦叶则提出的道德虚无论、以及末伽梨·瞿舍罗提出的宿命论等(Nathan McGovern, 2018)。公元前4世纪末，印度首个大一统王朝——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将佛教定为了国教，婆罗门教则不断式微，但并没有因此而遭受排斥。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在突厥人的帮助下，征服了信德和木尔坦，为南亚次大陆带来了伊斯兰教(Karl J. Schmidt 2015)。1215年，古尔王朝覆灭后，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相继建立，伊斯兰教成为了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而印度教等本土宗教则沦为被统治宗教(和红梅, 周月, 2017)。此后，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状态趋于缓和，但埋在两大宗教的矛盾依旧没有化开。在17世纪初期，英国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并通过该机构与莫卧儿帝国开展贸易往来。1757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与印度孟加拉王公对抗的普拉西战役中取得胜利，这成为英国殖民印度的开端。1857年，英国政府撤销东印度公司并直接统治印度，印度全境次年正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为了巩固殖民统治，英殖民政府推行“分而治之”政策，人为地制造宗教与民族矛盾，使得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发展使得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和红梅,

2018)。随着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间的对立日益激化，英属印度的解体已无法避免，英殖民政府在二战结束后，放弃了由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斯坦、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及各印度土邦组成“印度联邦”的独立方案，而选择了实行印度总督蒙巴顿提出的“印巴分治”，最终导致分别建立了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独立国家。

宗教对古印度历史发展，以及后来的印巴两国建国及随后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尤其在近现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民族国家建构就是以宗教来划分的国界，南亚次大陆以信仰印度教为主体的一部分民族建立了如今的印度，而另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教徒在今日印度边邻建立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是学界还没有阐述关于宗教在印巴两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具体作用的文献，更没有对其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献。探索宗教在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作用，既能帮助理解宗教力量对于国家机构的重要推动力，又有助于帮助分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是如何利用宗教来为各民族群体间推动共同体观念和国家凝聚力的，以及宗教建国又存在什么样的缺点，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所要探索的问题是，在印巴两国构建民族国家前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宗教在印巴两国的民族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又有着什么样的相同点和差异性？本文将采取文献研究的方法，以比较宗教对两国民族国家构建的作用为主线，首先整理相关文献对两国民族国家构建和宗教间的联系，然后分别对印度教对印度国家构建的作用和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民族构建的作用进行了单独分析后再进行比较，最后最后得出结论。

II. 相关文献对印巴两国民族国家构建和宗教间关系的解释和不足

当前的相关文献主要可分类为对于印巴分治前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和对于印巴两国建国原因的判断两个方面。首先学界对于印度教与

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及其在印巴建国前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在19世纪以前的伊斯兰教政权下，两教的矛盾并不显著，但此情况在英国殖民者推翻穆斯林统治以后有所改变。在东印度公司管理时期，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英国建立了雇佣印度本地人为士兵的“西帕农团”(Shipahi)雇佣军制度(John Kaye 2010)。东印度公司没有按照印度种姓制度传统，而是招收婆罗门和刹帝利阶层为雇佣军，并将各种姓阶层的印度人与穆斯林归入同一套管理体系下，享有同样的薪资待遇和地位，引起印度社会的不满。到1857年，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三个英国殖民地，共有20万名印度雇佣军，远超英国士兵的4万人(Pradeep P. Barua 1994)。1857年，原穆斯林贵族以“印度会全面沦为英国殖民地”为由，煽动雇佣军发动了印度民族大起义打击东印度公司，但这场起义在后者与21个土邦联手讨伐下宣告失败。此后，为了巩固殖民统治，英殖民政府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并人为地制造宗教与民族矛盾，对此有学者认为这使得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和红梅 2018)。1909年，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国大党提出建立自治政府的诉求下，颁布了《莫莱-明托改革》(Morley-Minto Reforms)，旨在通过民主选举方式组建自治政府(Mazhar Kibriya 1999)。在全印穆斯林联盟与《莫莱-明托改革》的刺激下，印度教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了加强印度教团结的重要性，纷纷组建以印度教为核心的政党组织(和红梅·周月 2014)。1915年，在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和米·施尔塔南德等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的推动下，印度首个印度教政党——印度教大斋会(All India Hindu Mahasabha)正式成立，这标志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迈向新的台阶(Prabhu Bapu 2013)。而在1920年，全印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在拉合尔决议上，提出建立一个以印度穆斯林为主的伊斯兰国家。随后在1925年，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海德格瓦的倡议下，成立了具有印度教极端主义色彩的国民志愿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招揽印度教徒加入组织的军事化训练，志在通过武力保障印度教徒的权益，并建立印度教国家(M.G. Chitkara 2004)。随着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立日益激化，英属印度的解体已无法避免，英殖民政府在二战结束后，最终选择了实行印度总

督蒙巴顿提出的“印巴分治”，分别建立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独立国家。印巴两国是以雷德克里夫线为基准，但在孟加拉和旁遮普地区的国境划分却引起了两国争执，这间接导致了原属巴基斯坦外飞地——东巴基斯坦的独立。

而对于印巴两国建国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是以宗教建国，因此独立初期两国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发生了难以计数的冲突、屠杀及报复事件，大批居民也因强制迁徙而沦为难民，至少导致50万人死亡，上千万人失去家园(Richard Symonds 1987)。另有学者认为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的出现是英国殖民者在南亚次大陆不断激化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历史产物，即英殖民者蓄意挑起信仰印度教的民族群体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群体的矛盾激化后，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伊斯兰教诸民族在研判未来独立之后有可能被信仰印度教的民族主宰后，抛出了建立另一个独立国家的想法(汪长明·傅菊辉 2011)。还有学者认为民族属性、国家认同感和威权政治是影响巴基斯坦民族国家构建的3个关键性变量，民族属性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所有巴基斯坦国民；国家认同则是分布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所有民族群体都能在伊斯兰教的框架下建构有别于印度的国度；威权政治则是在国家建构之初虽然缺少符合西方国家的民主政体，但是这种特殊的模式能够集中国家权力资源来克服在与印度进行博弈时的生存危机(Asaf Hussain 1976)。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以“民族”为集团单位类提出了民族在国家构建的作用，如有学者在分析印度和其他多民族国家整合问题时提出了“国家-民族”(State Nation)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民族-国家”模式往往采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地方自治性或者分离性政党被排除在政体之外，公民同时效忠于国家(State)与民族(Nation)。而“国家-民族”(State Nation)模式则与之相反，其往往支持多元文化并存，强化的是多元中的统一(Alfred Stepan 2008)。另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塑造疆域意识、塑造国家认同感作用以及在塑造民族自豪感方面的强大感召效用，已经在世界诸多民族建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¹⁾。“在后殖民时代，出于反殖斗争和建构国家认同的需要，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整合中的

作用显著(田文林 2009)”。而与其他地区民族依托“民族主义旗帜”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史实不同，印度共和国的诞生是由人们承袭千年的地理概念演化而来(王安琪，1984)，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则是人为操作占主导性因素所致的结果(Website of The Commonwealth 2021)。

从上可以看出，现存文献主要是从历史发展演变顺序对宗教矛盾和民族国家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跟踪分析，或者是对印巴两国的建国原因从宗教或者民族(民族主义)等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些文献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不过，当前文献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指出宗教是如何影响印巴构建民族国家的，以及宗教在建国过程中具体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在积极参考现存文献和发现不足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宗教在两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具体作用。

III. 印度教对印度民族国家构建的作用分析

印度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是在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作用的背景下，政客以印度教为旗帜，吸引民众构筑民族国家的过程。对于印度教的作用，可以从印度教的包容性推动了印度的世俗化和现代化进程、印度教被利益集团用来煽动民族情绪和构筑印度国家的意识形态三个方面。

1. 印度教的包容性推动了印度世俗化与现代化进程

“神圣”与“世俗”的关系是所有宗教都须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国家普遍以神圣与世俗二元对立模式处理这一问题，而对于宗教传统浓厚的印度而言，更倾向于将神圣与世俗统一协调来对待，宗教信仰中蕴含世俗观念，世俗生活离不开宗教指导。

从吠陀教到印度教的发展过程中，婆罗门种姓对宗教话语权的垄断，使

1)例如，在犹太民族尝试建构以色列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旗帜”就曾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整合到了今天的以色列国境内，并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实际国土疆域及国际法所承认的国家行为体——以色列国。

得南亚次大陆在伊斯兰教政权建立之前，都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国家。由于社会阶层没有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机会，社会阶层的固化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7世纪时期，引发了中下阶层对教义和规范的批评和不满，兴起了“沙门思潮”(Samana)，各阶层围绕世界观、人生观、宗教精神等哲学问题，进行思考与反驳传统婆罗门教思想。婆罗门贵族为了重获势力版图，开启了印度宗教融合进程，因此印度教内部有不同派别，且各派别的哲学思想和实践信仰活动差别甚远，这也是印度教拥有极高包容性与开放性的主要原因。

印度教原先是以万物皆有灵论为基础的多神崇拜，到了公元8世纪至15世纪期间，南印度地区首陀罗种姓，为了反对佛教与耆那教势力的统治，并争取进入印度教寺庙膜拜神灵的权利，掀起了横跨南印度泰米尔纳德邦至北印度卡纳塔克邦的帕克蒂运动(Bhakti Movement)，推动了中世纪印度教的改革(姜景奎，2005)。帕克蒂运动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薄伽梵歌》、《薄伽梵往世书》和《帕克蒂经》，主张通过对神的无限虔爱来获得解脱(姜景奎 2003)。其中，商羯罗(Sankara)所主张的“梵”为印度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商羯罗是吠檀多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奥义书”、《薄伽梵歌》等经典为思想依据，提出吠檀多不二论，主张世界唯一实在是梵，一切外界事物并非真实的，而人要获得解脱唯有破除“无明”，证悟到梵的唯一(Veraswamy Krishnaraj., 2002)。此外，商羯罗效仿佛教僧伽的方法建立了僧侣组织和神庙，并简化婆罗门教的繁文缛节，提倡智瑜伽和简易的拜神仪式，大大地推动了印度教的发展。公元11世纪时期，婆罗门教改革家罗摩奴阇(Ramanuja)将商羯罗的吠檀多哲学和帕克蒂思想相结合，创立吠檀多限制不二论，进一步丰富了帕克蒂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罗摩奴阇认同“梵”是世界的最高本体，发展了《薄伽梵歌》中的帕克蒂思想，认为只有通过对神的无限虔诚和热爱，才能实现解脱(孙晶 2013)。此外，他也主张在神面前个体灵魂的平等，其所建立的毗湿奴教派吸收了低种姓者及妇女为信徒，打破了婆罗门教的种姓偏见。

帕克蒂运动淡化了瓦尔那阶序，尽管严密的种姓制度依然扎根民心，但崇拜对象的简化、信仰方式的转变、对平等观念的提倡等一系列革新，为

近代印度教的世俗化提供了本土的思想和行动基础。在英国殖民时期，殖民政府针对印度教的一些陋俗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及法令，让印度逐渐走向现代世俗化进程。

印度教新兴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文明思想的借鉴和吸收，以及对印度教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中，掀起了近代印度教改革，这也标志着印度教世俗化的正式开启。由于印度教的派别多样性及其回归宗教哲学的本质，使得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在择取印度教传统思想为发动广大信徒和民众的思想武器时，并不妨碍印度以世俗化的民主政治和现代化行政管理建设民族国家。因此印度独立后实行政教分离，将世俗主义定为国策之一，并没有掀起印度教徒的反对声浪，反而有效地抑制了宗教冲突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如尼赫鲁在给那旺伯·沙赫伯(Nawab Saheb)的信中写道：“我相信印度将成为一个世俗国家，所有宗教和文化享有完全的自由并相互合作。我相信，印度只有保持自己多个世纪以来发展的复合文化才能够变得伟大”(S. Gopal, Uma Iyengar 2003)。印度独立后的宗教世俗化主要体现在现世观念、人权意识以及教徒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是印度教在面临基督教与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自我变革的结果。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教派冲突有加剧之势，但始终没能动摇印度深入人心的世俗化政策。综上，印度教理论在发展进程中回归宗教哲学本质，使之从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中形成独立个体，且印度教的高度包容性，推动了印度民族国家独立后实行世俗化政策，确保了各个宗教的和平相处及平等身份，避免了激烈的教派冲突，从而维护了印度的统一。

2. 成为利益集团煽动民族情绪的政治工具

印度教是印度唯一能够建立各地区对国家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的意识形态。虽然印度自建国以来实行了世俗化的政教分离政策，但印度教的号召力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当政府举措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发展成果或社会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时，有关利益集团，尤其是在野党领袖，会煽动印度教教派主义来动员社会力量以争取政治利益。这种民粹主义是周期

性的复发现象，一般出现在社会转折期，并常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新的社会问题相结合(俞可平 1997)。从印度独立至今，议会民主制已在印度深深扎根，政党要取得执政权，唯有遵守选举制度与规则，以及了解选民投票的理性选择。因此要赢得选举胜利，政党必须迎合最广大的选民，即中产阶级以下的群体，最有效的方式是政党候选人通过操纵身份政治、用社会议题分化民众，诉诸于情感共鸣和道德感召，与支持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1914年，印度教大斋会的成立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1925年，国民志愿团在萨瓦尔卡(V.D. Savarkar)提出的印度教特性概念基础上，抛弃印度教的宽容特性，并结合现代民族主义的排斥特性，倡导以武力手段建立印度教国家。国民志愿团领袖高瓦克(Madhav Sadashiv Golwalkar)在其著作中以“Hindu”一词来取代“Indian”为“印度民族”(Ajaz Ashraf 2018)。在高瓦克的民族理论下，“Hindu”是由共同的地域、种族、宗教、文化和语言构成的政治民族概念，而“Indian”则是在“Hindu”中的文化民族(Ethnic)(Christophe Jaffreloted 2007)。但高瓦克的民族主义带有很强的种族主义与宗教色彩，在这一概念下，非印度教徒只能受印度教徒的支配，对于前者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使非印度教徒皈依印度教以成为印度公民；二是离开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伊斯兰教政治团体的建立以及日益严峻的教派冲突。萨瓦尔卡、高瓦克等民族主义者提出的印度教特性概念，旨在于服务与维护印度教集团的政治利益。在印巴分治以前，印穆冲突的白热化及英殖民政府的分治方案，确立了两个独立国家的建立，因此印度教特性概念趋于边缘化，让位于世俗主义，以争取南亚次大陆地区非印度教徒和各土邦对印度的支持，使印度实现民族国家统一。

1950年1月，印度颁布首部宪法，确立印度的议会民主政体。1951年印度第一次全国大选前，印度教大斋会副主席萨玛·穆克吉(Syama Prasad Mukherjee)在国民志愿团领导人戈瓦尔卡的支持下，成立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并宣布参与竞选(林承节 2004)。人民同盟以国大党损害印度教徒利益和亲穆斯林为口号(Myron Weiner 1990，并否

定印度多元文化共存的特点，指出将向非印度教徒灌输印度教文化思想(Donald Eugene Smith 1963)。但由于印度国大党在自治时期在政治、经济和印巴战争中的优越表现，人民同盟在议会中只得到3个议席，其力量主要集中在印度北部地区。支持者是以中产阶级、富裕农民为主的高级种姓群体(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1951)。此后的十年间，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被边缘化，其势力陷入低潮，主要有3个原因：一，印度提出的不结盟运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同，灵活的外交政策巩固了印度在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二，印度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土地改革和计划经济政策取得了良好成绩，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等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高了人民对国大党的支持率；三，印度采取扶持民族产业、限制外国资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推动了私营工业的发展，也维护了印度民族主义情绪。然而，1962年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升级、中印爆发边境战争、大量印度教徒皈依基督教等事件，使得人民对尼赫鲁的不满日趋上升，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再次卷土而来。人民同盟要求印度政府加强国防建设，并与军事强国建立良好双边关系。戈瓦尔卡指出“每个印度神都有武器”，但印度被国际社会描述为一个非暴力国家。他认为只有印度教教义、印度文化自豪感和秩序取代尼赫鲁“温柔”的“伪世俗主义”时，印度才能回到吠陀的黄金时代(Sreeram S. Chaulia 2002)。在1962年全国大选中，人民联盟依靠印度教民族主义赢得了14个议席。1966年，具有宗教狂热性的湿婆军(Shiv Sena)成立，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自此笼罩着印度社会，印度境内的印穆冲突时而发生，并经常引发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应，加剧了国家内的宗教教派冲突(和红梅·周月 2014)。

3. 构建印度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印度知识分子为了塑造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以印度教为构建民族国家的身份纽带。印度教这一宗教信仰确实凝聚了南亚次大陆各民族争取印度自治和独立的社会力量，但宗教始终只是一个信仰，以宗教为单一意识形态构建民族国家很难从政治本质上催生认同感。此外，印度教的多元化使

得各地区的仪式、教义、习俗等有所不同。因此笔者认为，印度精英提出以宗教立国有两个原因：一，英殖民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政策，以省和土邦而非语言为单位划分管辖区，唯有宗教能整合各地区人民对国家统一的追求；二，为了与穆盟提出以伊斯兰教立国分庭抗礼。但整体而言，以宗教为构建印度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无法起到政治民族塑形的作用，在其独立后也遭受了不少的挑战。

在印巴分治前，印度国大党利用印度教整合社会力量，将语言建邦纳入选举纲领中，并提出以母语人口最多的印地语为国家官方语言，赢得了各地区民族的拥护。但印度独立后，由于印巴由于印巴分治导致的印穆冲突，促使国家领导人更多地从国家统一的角度考虑问题，尼赫鲁、帕特尔和帕特拜·斯塔拉玛雅组成“JVC委员会”研究语言建邦问题后，认为印度按照语言建邦会引发民族分离运动，拒绝实行该方案。政府的态度激起了印度各地区民众的不满。1952年，国大党魁拉提·斯利马穆卢为抗议政府态度绝食而亡，引起了泰卢固地区发生骚乱，政府被迫同意建立安德拉邦(Rinchen Norbu Wangchuk 2019)。政府这一举措让各地区要求语言建邦呼声四起，印度政府于1956年再次对语言建邦进行探讨，通过了邦重组方案。

由于各土邦加入印度后，使得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人数超过绝对多数，故此，印度围绕国语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英殖民统治时期，英语实际上已有印度官方语言地位，但基于历史经验，印度领导人认为全国有必要使用统一的本土语言，来维护国家统一和塑造民族意识。印地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也仅占总人口的46%。1950年，印度宪法将印地语列为国语，英语为官方语言，但英语的地位只有15年，随后则被印地语取代。在没有任何语言使用人数过半的情况下，印度政府赋予印地语高出其他语言的地位被视为对其他语言的蔑视和不尊重。与宗教相比，语言是一个民族区分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更具有政治势能。当民族主义者以印度教为号召争取民族独立时，印度各语言文化民族也对本民族的权利和文化特性有所追求。如印度南部使用泰米尔语和乌尔都语的各邦指出政府实行“印地语帝国主义”，扶持北方印地语群体压制南方非印地语群体，

泰米尔纳德邦的人民进步联盟，更宣称要建立单独的“德拉维达斯坦国”(Abdul Ruff 2017)。印度政府迫于压力，于1963年推出《官方语言法》，将印地语、英语和各邦语言规定为联邦语言。

标准化的语言媒介产生了文化同质性，即把相同的文化单位当成政治生活的基础。宗教共同体的想象基于语言，语言的“神圣性”塑造了共同体的认同感。印度政治精英将印度教视为政治动员、与伊斯兰教对立、推动民族国家独立运动的工具，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即印度贵族或政治精英追求同质(homogeneous)的表现，目的是让感受到同源的人们团结起来反抗外来威胁。(厄内斯特·盖纳尔 2002)印度精英运用宗教来塑造公民对民族的身份认同，要求各民族将其他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以建设文化同质性为新统治秩序建立合法性，树立起民众对国家的忠诚(迈克尔·赫克特 2012)。然而，当巴基斯坦独立和各土邦归属问题解决后，印度人民的假想敌不复存在时，以宗教构建的脆弱民族意识必然受到相应的弱化，民族文化属性更强的语言民族主义影响力则会高于宗教民族主义。

IV. 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民族国家构建的作用分析

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民族国家构建的作用，则主要是奠定了巴基斯坦的立国基础和民族身认同、主导了国家政治和引发了超越民族的宗教认同等三个方面。

1. 奠定了巴国的立国基础及政治民族身份认同

学界指出，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作为国家的缘起和诞生密切联系的历史原因，始终是八国政治生活的核心(Leonard Binder 1963)。从本质上来说，民族主义与宗教是冲突的(Joel Carmichael 1957)。从本质上来说，民族主义与宗教是冲突的。因为宗教是超越地域、民族、种族、甚至是时空的意识形态，而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指向特定的人群。当民族独立在确

立政治民族身份认同时，一般都诉诸民族主义中的文化内涵，以确立本民族的文化地位作为新的民族身份认同特征。

印巴分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穆之间的宗教冲突，两大宗教有着不同的信仰体系、宗教教义和宗教习惯，这种差异使得双方信徒在心理上存在着对立情绪。伊斯兰教于公元8世纪传入南亚次大陆，并曾在16世纪建立过统一的伊斯兰政权——莫卧儿帝国，但由于伊斯兰教缺乏历史根基，印度教文化影响力极大，因此两个宗教始终处于分庭抗礼的格局。英殖民政府统治的确立，打破了印穆之间的和谐对立局面，也让原处于统治阶层的穆斯林成为被统治群体。生存空间与精神空间不断被挤压，使得穆斯林失去了表达诉求的能力。另一方面，殖民政府扶持印度教为新兴统治阶层，伊斯兰教的影响力不断式微。这种种因素引发了以宗教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启蒙，伊斯兰教的知识分子通过将烙印在穆斯林身上的伊斯兰教文化、历史、时间和民族性进行“置换”与“编码”，塑造“他者”来确定其民族的边界和身份认同，形成对抗殖民政府与印度教群体的社会力量。

伊斯兰民族主义理论家赛义德·汗(Sayyid Ahmad Khan)于1883年首先提出“两个民族理论”，指出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其信徒即为“两个民族”(Yasmin Saikia·M. Raisur Rahman 2019)。赛义德提出的理论是以宗教为核心划分的文化民族(Ethnic Group)概念，但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宗教理念与政治实践赋予了穆斯林以“政治民族”属性。从1909年《莫莱-明托改革》到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生效期间，印穆政治精英围绕穆斯林单独选举区制和穆斯林邦展开争论。穆斯林宗教家伊克巴尔(Allama Iqbal)进一步深化“两个民族理论”，于1930年表示他“愿看到旁遮普、西北边境省、信德、俾路支斯坦合并为一个国家，这一自治政府将是印度的穆斯林，特别是西北部穆斯林的最终结局”(Ahmad Aziz 1970)，该结论确立了巴基斯坦民族争取政治、民族与文化独立的地理空间边界。1940年，穆盟领袖真纳更明确地阐述“两个民族理论”这一思想。真纳认为，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宗教，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那些以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可以融为一体并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民族想法，不过是一种幻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属于两种不同的

宗教哲学范畴、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二者互不通婚，互不共食，所以二者实际上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源流，其基础是相互对立思想和概念。二者关于生活的理解和遵循的生活方式也有差异。显然，无论印度教徒或穆斯林，都是从各自不同的历史源流吸取思想灵感。他们各有自己的史诗、英雄人物和事迹。而且还往往有这类情况：这个民族的英雄是另一个民族的仇敌。同样的，他们的胜利与失败是相互交织的。从任一意义来看，穆斯林都是一个民族，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家乡、疆域和祖国”(Jamil ud-Din Ahmad 1985)。1947年印巴分治前，穆盟掌握了信德省、西旁遮普和东孟加拉等选区的多数议席，而这些席位强化了巴基斯坦民族对“领土”的意识。

1947年，英殖民政府颁布的“蒙巴顿方案”，将英属印度划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自治领。随之而来的建国过程伴随着印穆大迁徙时双方的互相残杀，短短数月内造成超过50万人丧生，这段经历对巴基斯坦民族而言是刻骨铭心的。巴基斯坦的建立象征着南亚次大陆穆斯林抛弃了先辈建立的家园，因此该国独立后沿着体现伊斯兰民族国家的治国方向发展，不仅能够代表南亚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延续，也能够使全体穆斯林社会化，形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总的来说，尽管民族主义与宗教是相悖的，但对于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而言，二者之融合是有历史传统的。古兰经中提出的“乌玛”(Ummah)观念是穆罕默德为统一的阿拉伯政权构建的，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穆斯林社会生活共同体。在“乌玛”理念下，政治与宗教从来没有真正的区别，而这种共同体是形成政治民族的雏形。伊斯兰教在南亚次大陆建立的政权对于穆斯林而言不仅是家国，更是宗教精神的中心。因此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身份认同会较早地在穆斯林社会启蒙，是因为英殖民政府全面接管印度解体了长期以来的政治认同与宗教中心。在这种背景下，穆斯林开始思考如何创建新的政治制度，来处理新环境下的宗教发展问题以及生活共同体的生存问题。简而言之，巴基斯坦因伊斯兰教而生，为伊斯兰教而存。对巴基斯坦民族而言，以伊斯兰教立国是基本原则，更是穆斯林的心理契约和精神共识。

2. 伊斯兰教逐渐主导巴基斯坦政治

“政教合一”是伊斯兰教政权的传统统治模式，是实现《古兰经》中“乌玛”理念的政治实践。英殖民时期，受西方教育的印度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发展问题及新的政治体制有所思考，试图融合伊斯兰教传统与世俗化以推动民族国家独立。代表穆斯林资产阶级的全印穆斯林联盟主张实行世俗主义，坚持巴基斯坦政教分离原则；伊斯兰教派团体则坚持将伊斯兰教视为官方意识形态，巴基斯坦应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真纳在多次讲话中提及他关于伊斯兰教作用的三个层面：一，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体系，其中心教义就是将信徒视为穆斯林；二，伊斯兰教是一种文化体系，其生活方式让全体穆斯林统一于一个民族国家中；三，伊斯兰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其价值观念可使穆斯林社会化，从而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Jamil ud-Din Ahmad 1985)。根据真纳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他并没有提出宗教的政治性作用。笔者认为是因为以真纳为首的穆盟致力于推动现代民族国家进程，推崇政教分离模式，只在原则上肯定伊斯兰教与国家政权的联系，反对宗教过多地干预政治和国家事务。真纳希望巴基斯坦建国后，能完成从以宗教为基础的文化民族主义，深化为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变。但真纳于1948年逝世后，在穆盟内没有能够继承其政治思想的领导人，伊斯兰教派试图填补巴基斯坦领导真空的局面，使得教派势力参政欲望日益增长，宗教逐渐主导巴基斯坦官方意识形态。

在印巴分治前，穆盟虽然是印度穆斯林中最大的政党，但其影响力却不及教派团体。因此穆盟选择以宗教团结，号召印度穆斯林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并利用宗教立国的理念以获得教派团体的支持。建国初期，巴国制宪议会委员会设立一个由宗教学者组成的“伊斯兰教义顾问委员会”，负责起草反映正统派观点的宪法草案。正统派主张类似于“哈里发制度”的“代行主权制”和宗教立法，要求将伊斯兰教法凌驾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但制宪议会委员会拒绝接受，政教对立情绪愈演愈烈(Muhammad Iqbal

2019)。1953年，自由伊斯兰委员会、伊斯兰促进会、巴雷尔维派等“正统派”试图通过打击艾哈迈迪亚派以削弱穆盟的执政合法性。正统派组建行动委员会，要求联邦总理卡瓦贾·纳兹穆丁宣布艾哈迈迪亚为非穆斯林政党，辞退所有该党派的政府官员。联邦政府不仅不接受行动委员会的请求，更下令逮捕委员会首脑，使得行动委员会在卡拉奇、拉合尔、拉瓦尔品第等城市组织示威、暴乱和罢工行动，更指责政府犯下亵渎罪，激起穆斯林反政府的情绪²⁾。巴国政府在部分地区实施军事戒严后，暴乱事件逐步平息，但教派对政治的影响力却进一步扩大。

1956年，巴基斯坦举行第二届制宪会议，向宗教界做出了妥协：一，将国名改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国共和国”，强调人民的权利是真主赐予的；二，成立“中央伊斯兰教研究所”，负责协助政府在伊斯兰教义基础上构建穆斯林社会；三，设立法制监督委员会，确保国家通过的法律不得与《古兰经》和《逊奈》相矛盾，并在时机成熟时，将国家现行立法、法律、法令与伊斯兰教义相一致。1958年，阿尤布·汗开启军人统治，为了获得宗教界的支持，取消并禁止巴国政党活动，并建立特别军事法庭，对非宗教性质的政党进行调查和限制，甚至监禁和拘留政治家。虽然伊斯兰教派势力在阿尤布·汗政府下得以壮大，但实际上阿尤布·汗致力于把巴国推向西方资本主义化和世俗化，宗教界的影响力仍然置于国家的控制和监督之下，伊斯兰教仅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和象征。如阿尤布·汗在1962年对宪法作出修订，删除国名中的“伊斯兰”一词，改为“巴基斯坦共和国”以显示国家的非宗教性质。此外，宪法也删除了国家法律与《古兰经》和《逊奈》须一致的条文，但这些调整遭到了各教派的强烈反对，政府被迫作出妥协：一，恢复国名中的“伊斯兰”一词；二，成立伊斯兰教意识形态顾问委员会为总统的法律顾问，确保立法与伊斯兰教义吻合(杨洪贵·付玉冰 2018)；三，对穆斯林实行伊斯兰教义教育(M. Rashiduzzaman 1970)。另一方面，巴国政府于1962年7月有限地恢复政党活动，要求政党活动必须以伊斯兰教为基础。该政策实质上将世俗政党活动与宗教相结合，但却也助长

2) 艾哈迈迪亚是巴基斯坦逊尼派的教派之一，是穆盟主要的支持者。由于创始人将伊斯兰教与现代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被“正统派”视为“异端”

了教派参政的欲望。自此，巴基斯坦历届政府无论实行怎样具体的政策，却无法放弃宗教立国的基本原则。

从巴基斯坦建国以来，政教双方在民族国家政体问题上都有妥协，但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斗争始终无法回避。巴基斯坦曾是英国殖民地，西方文化和政治文明对巴基斯坦影响较深。因此巴基斯坦以宗教立国后，必然存在现代知识分子与伊斯兰教派的矛盾。伊斯兰教是政治属性较强的宗教，巴基斯坦允许教派参政的举措强化宗教对政府事务的影响力；政党是以执政和维护自身利益为目标的组织，因此当政党成功利用宗教的社会力量达到团体的目标时，民族国家形态必然会从世俗化逐渐走向传统主义。

3. 宗教认同大于民族认同，极端主义深化

“乌玛”是伊斯兰教信仰重要的组成部分，常作为伊斯兰民族国家重建超越民族、种族、地域限制的穆斯林共同体的核心理念(钱雪梅 2008)。印巴分治时期，伊斯兰思想家阿布·阿拉·毛杜迪强调一切主权归于真主，提出伊斯兰社会应由穆斯林来领导，因此穆斯林应积极接受伊斯兰教条，主动投身于保卫伊斯兰的斗争中。穆盟致力于推动政教分离的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但巴国建国之初，经济基础薄弱使其建国任务艰巨，因此不得利用伊斯兰教为纽带发展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以摆脱外交孤立和地缘政治的劣势局面。巴基斯坦不仅与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签订友好条约，更极力倡导各地穆斯林的民族自决权，为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国的独立运动作出巨大贡献(Aparna Pande 2011)。但这一时期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是脆弱的，主要有3个原因：一，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巴基斯坦一样，刚从民族复兴运动中独立，因此在经济与军事上实力较弱；二，巴基斯坦以宗教立国，其主动的外交态势被伊斯兰国家视为挑战宗教话语权地位；三，巴基斯坦为了获取大国军事援助，同被阿拉伯国家拒绝同盟的美国达成巴美军事协议。直到1963年，美国向印度提供武器，使巴国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在1965年印巴战争结束后奉行“双向主义”，在维持大国平衡外交前提下积极发展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1971年印巴第三次战争期间，约旦、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伊朗等阿拉伯国家与巴基斯坦结盟，向巴国提供军事援助。但阿拉伯国家所提供的援助是美国政府为了抵制苏联支持印度的行为而间接支援的，并非其本意。直到1976年，阿拉伯国家才自发地为巴基斯坦提供9.93亿美元的财政贷款，占巴国财政援助的三分之一(Hafeez Malik 1993)。由于巴基斯坦的西南部海域，是海湾国家向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输出石油的必经之地，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与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旨在于避免海岸线出现敌对势力；巴基斯坦是苏联侵入中东地区的前线国家，凭借着地理优势，巴基斯坦获得了美国在外交和经济上的扶持。同时，也由于巴基斯坦是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反苏”联盟国之一，因此在1979年伊朗革命和阿富汗战争时期，巴基斯坦被迫卷入地区事务。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合作，巴基斯坦向22个中东和北非国家派遣军事代表团，并以保护伊斯兰圣地为名，在沙特阿拉伯驻扎约2万人的军队(Christophe Jaffrelot 2016)。另一方面，美国和沙特出于战略考量，派遣约3.5万名来自40个国家的穆斯林以加强“反苏”势力(Mohammad Amir Rana, 2005)。正因为美国与中东国家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庞大的军事、财政和人员援助，再加上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使得宗教极端主义得到了空前发展。

总的来说，巴基斯坦独立时为了摆脱外交孤立，利用其宗教立国的态势与伊斯兰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外交行为，但实质上并没有强化巴国政治民族意识，反而加强了人民对宗教的认同，甚至对“乌玛”共同体抱有憧憬。虽然巴基斯坦反恐怖主义行动有所成效，但恐怖主义活动主要基于宗教极端主义的国内极端武装组织、民族分离主义组织及教派分裂组织，因此政府在倡导“宗教治国”的理念下，会为了取得成效与穆斯林情绪的平衡而弱化打击能力，使得宗教极端主义得以牢牢扎根，影响巴基斯坦构建现代民族意识。

V. 比较宗教在印巴两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作用差异

通过上面对两种宗教分别对印巴民族国家构建的作用分析后，本文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重新回归到宗教这个范围，并以比较分析的方式讨论宗教对于印巴两国建国的作用差异。

1. 教是构建印巴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但存在明显的凝聚力差异

敦煌地处于中国河 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是18世纪西方民族国家建立的产物，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主义给予自己的阐述。就如厄内斯特·盖纳尔所说的：“民族主义是只大象，每个研究者摸到的都只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厄内斯特·盖纳尔 2007）。民族(Nation)是由国家内部，具有相同或不相同种族、语言、宗教信仰、风俗等背景的各个文化民族，即英文语境中的“Ethnic Group”组成。换言之，统一政治实体下的文化民族在经历后天集体身份和主观意识归属的塑造后，形成了具有动态性的、政治的“政治民族”。因此民族主义反映的是政治民族在“经过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互影响与作用，在已有的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强烈地显示出对整个民族及其国家的热爱与忠诚”（王联 2017）。印巴分治前，“印度人”只是一个民族意识相对淡漠的民族，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民族认同（邱永辉 2009）。“印度”对于南亚次大陆居民而言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因此当东印度公司通过武力手段开启殖民统治时，印度无法形成明确的抵御外侮观念，不能团结一致，共同对外。随着南亚民族主义思想兴起，在英国“分而治之”政策及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印度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建设抱有憧憬，但由于印度疆域之广泛、语言和习俗之差异，无法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展开反英殖民斗争。因此印度政治精英试图以宗教为旗帜，推动多元民族国家独立。但这却塑造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产生民族排他性意识，均强调以宗教立国，最终走向印巴分治的道路。

自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以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社群已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对立，你我又各有特征的多元统一体”（邱

永辉 2009)。印穆两大社群以宗教构建了文化民族认同，在哲学思想体系、价值观、历史文化记忆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和不同的认知。印度教是一个宽泛、内涵复杂丰富的宗教体系，其包容性与伸缩力较强。从吠陀教至印度教理论基础的奠定，印度教的发展进程中与其他宗教相互接触时，不断地吸收其他宗教的相关教义、仪式和信仰崇拜，最终融合成自身宗教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印度教徒而言，英国殖民统治只是取代了穆斯林统治，在政治上接受殖民统治并努力适应之。尽管在伊斯兰政权和英殖民统治中出现信徒皈依其他宗教的情况，但印度教的根基却从未动摇，以宗教为主导的印度文化，依然能够较为完整地生存下来并主导社会。另一方面，由于穆斯林曾是南亚次大陆的统治者，因此穆斯林对于英国殖民政权抱有抵触情绪，不愿去适应形势变化和学习西方文化，以至于印穆对于民族国家建设理念差异日益扩大。

经历数千年的改革与整合，印度教成为了南亚次大陆地区多数民族的主体信仰。无论是受伊斯兰政权或英殖民政府统治，印度教徒普遍认为自身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因此印度精英在推动民族国家独立运动时，并没有诉诸宗教情感，反而推动建设一个不分宗教、种族、地域的世俗国家，整合民族力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伊斯兰政权在南亚扎根近5个世纪，对于穆斯林而言，英属印度是本族传统聚居地，拒绝接受被“他族”统治。但穆斯林数百年间都以少数族群统治印度，并没有建立政治认同感。因此穆斯林知识分子借助宗教信仰为动员力量，鼓吹建立属于穆斯林的“乌玛”。印度知识分子对穆斯林垂涎印度自治统治权感到担忧，担心印度将遭受“伊斯兰化”，因此他们也试图唤起各地人民对印度悠久的宗教、历史文化的美好记忆，在统一的政治实体中打造文化共同体。

总的来说，宗教是构建印巴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但是，印度原本不需以宗教立国，只是由于受到穆斯林的刺激后，才用宗教整合文化民族的国家意识。加之印度教并非一神教，因此本身凝聚力很弱，导致在建国初期，印度用宗教整合文化民族的国家意识时出现内部民族争议的情况。另一方面，伊斯兰教本身就是倡导政教合一的宗教，因此巴基斯坦建国前后都能够很好地凝聚穆斯林的力量。但因为缺乏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国父真

纳在建国不久后身亡，无法贯彻其现代治国理念，因此教派力量试图主导政权，引领巴基斯坦走向伊斯兰化道路。

2. 教思想虽引领了政党纲领和政府政策，但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不同

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印度教精英虽然对印度教经典及理念加以诠释，使之成为发动印度民众推动印度民族国家建设的思想工具，如国大党领袖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运用《薄伽梵歌》鼓励教徒积极入世，提出印度自治是为了实现民族的“达摩罗阇”(法治)，诠释民主派政治纲领的合理性(欧东明 2004)；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h)提出印度民族应将印度视为“祖国母亲”，宣扬对神的最高奉献是为祖国献身，因此追求民族自治和平等是对神意的遵从、崇敬和忠诚的表现(Suneera Kapoor·Sri Aurobindo Ghosh·Bal Gangadhar Tilak 1991)；甘地以吠檀多泛神论思想为依据，提出“真理即神”理论，号召民众以“非暴力不合作”形式投身于民族国家独立斗争之中(Angadi Ranga Reddy 2009)。但整体来看，印度教精英依然是基于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推动主权国家建设，宗教仅为号召各民族对民族国家的热爱与效忠的思想工具而已。印度国大党和人民党虽然都主张世俗民族主义纲领，但一旦政党需要利用教派主义强化政治行动的正当性基础，引导民意与制度规范相对抗时，政党将会把某一教派利益单独置于其他利益至上。如1984年选举，印度国大党通过宣传英迪拉·甘地总理被锡克教徒刺杀事件来加强印度教的身份政治认同，使其赢得较上届大选多51个议席；1998年，人民党联合12个右翼宗教性政党组成全国民主联盟(NDA)，以“印度教特性概念”为政党意识形态，强调国大党在阿约迪亚事件上的无作为及行政上的腐败风气，加强人民对统治精英的对立等，都是教派主义影响印度政治的强烈讯号。但印度教对政治的影响力只会出现在社会转折期，并会在新的社会条件产生后逐渐消逝。

宗教对巴基斯坦政治的影响力比印度更强，因为伊斯兰教以教义为指导守则，因此信仰对象作为外在的异己力量，对信仰群体具有主宰一切、至高无上、神圣且不可侵犯的特征。巴基斯坦以逊尼派哈乃斐学派为教义，

而教义对信仰群体的思想、行为、道德进行规范和约束，成为人民生活的最高指导和区别于其它群体的特质。因此其所产生的心理基础往往较为牢固，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刘海峰 2006)。当教义的基本原则受到外来挑战，包括伊斯兰教其它学派、非伊斯兰教信仰、国内政治、国际环境时，就容易引起对立状态，如正统派对艾哈迈迪亚教派的围剿、巴国政府颁布打压印度教徒的政策、巴国穆斯林对印度宗教政策的反对浪潮等。巴基斯坦以宗教为基础的伦理和法制体系“不仅是一种深层次的作用广泛的文化心理现象，更是一种带有不同程度强制性的文化社会现象”(胡祥云 1998)。在这种体系下，政府事务与宗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维护宗教权威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因此政党所提出的纲领与政策必须迎合伊斯兰教派势力及符合主流教义。另一方面，穆斯林拥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宗教集体情感，伊斯兰世界的任何动态都将影响巴基斯坦政府与人民的反应及情绪。巴国政府对外政策除了以维护国家主权为目标外，还以实现“穆斯林民族”的“乌玛”共同体为己任。因此伊斯兰教自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在构建民族国家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对印度而言更能够快速整合国内社会力量。

3. 在强化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方面存在明显程度差异

根据马克思对民族的定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是构成民族的四个重要因素，而宗教主要为形成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提供了基础。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为宗教信仰者提供的认同感具有双重意义。除了“通常所指的个人对宗教群体的认同、归属、情感之外，还特指信仰个体对神的强烈归属感和情感依赖、神秘体验，以及对宗教创始人、先知、圣人的情感归属和神秘体验(邱永辉 2009)。宗教所提供的这种心理认同有时候比民族的地域归属、语言认同和共同的生活体验更具有强烈的连系作用。当一个民族群体都信仰同一宗教时，宗教认同往往能够强化民族认同，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转化为民族认同，那么能够起到二者合而为一，相互巩固的作用(肖珺，2016)。印度与巴基斯坦是多民族国家，虽然宗教强化了内部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但实际上两国构建方式亦有所不同。

从印度教的发展史来看，商羯罗将印度教徒的偶像崇拜观念转向对“梵”的追求，到罗摩奴阇将商羯罗的吠檀多哲学和帕克蒂思想相结合，创立吠檀多限制不二论，建立的毗湿奴教派推动了印度多神崇拜向一神崇拜转化，淡化原有的三大主神崇拜，推崇黑天、罗摩、林伽、释迦佛等毗湿奴的化身，二人将“神”视为一种无形、抽象的精神实体，并要求信徒追求个人修行以达成对神的崇敬，实际上为印度教整合了内部不同本土宗教的借鉴色彩，而这也体现了印度教的高包容性与伸缩力。印度教的多元化教义、主神崇拜与祭祀习俗实际上无法构建一个统一的、具有强烈认同情感与政治动员能力的宗教信仰，因此相对宗教文化民族而言，印度教徒更认同于其原生民族，即由血缘和地域关系组成的氏族和部落集团。笔者认为，印度独立后能够持续地推行世俗化进程，朝现代民族国家发展，主要有3个原因：一，殖民政府对印度社会的传统陋习制定和出台了世俗化法律和政策以进行制止，并采取了一系列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举措，如兴办现代化学校、创办英文报刊、支持英国传教士的传教等，打破了印度社会的闭塞状态，而民众相对印度教文化更乐于接受新兴的世俗化生活方式；二，英殖民政府扶持印度资产阶级协助处理政府事务，使后者对西式世俗民主体制更向往。由于固化的种姓制度让下层阶级无法参政，因此资产阶级在争取印度独立时以其集团利益为治国之道，表面上是强调以印度教立国，但实质上是建立以宗教包装的世俗化政权；三，自公元前300年的列国时代以后，南亚次大陆地区就没有出现过统一且强大的印度教政权。而印度教传统的婆罗门统治方式并不适用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且世俗化政权更能够争取各部族加入印度联邦。因此，在世俗化进程的推动下，宗教利益仍然置于主权和民族利益之下，印度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要大于对印度教的认同。

巴基斯坦与印度正好相反，国内占97%的穆斯林居民对宗教的认同会优先于对国家的认同，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民族的族源认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神话传说往往是构建民族起源的观念。伊斯兰教并非南亚次大陆的本土宗教，阿拉伯人征服印度地区后为了强化执政合法性，通过征服、威逼利诱等方式让本土民族改宗，而伊斯兰教的

起源、教义与神话传说只以《古兰经》为核心，这种一神论文化有效地重构本土民族的文化背景，使其成为穆斯林共同体的主体氏族。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让统治者能够运用宗教的神圣性与各民族的英雄主义塑造公民对民族的身份认同，要求民族将其他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以推进直接统治。这种以共同的宗教信仰来联系各族身份的统治方式，形成了巴基斯坦现代政治民族概念的基础。因此，当伊斯兰政权被英殖民政府取代、统治阶级从穆斯林变成英国人与印度教徒时，穆斯林同质化的民族认同促使穆斯林对宗教立国更为向往，在身份认同意识上更为强烈。因此，巴基斯坦这一国家的建立是英属印度穆斯林深刻的民族因素作用的结果，独立后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也是基于《古兰经》中的“乌玛”理念所塑造的。

综上，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均强化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但印度是弱宗教认同的民族国家，而巴基斯坦则是强宗教认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既可以团结各民族一致对外的力量，但若情绪受极端、非理性的意识控制，也将会发展成盲目排外、拒绝世俗道义的蒙昧主义，为民族国家带来巨大的伤害。

VI. 结论

蒙巴顿的“印巴分治”是英属印度境内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对立激化和二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热潮的联合产物，导致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构建了民族国家。1947年8月，印巴分别以自己的教徒为中心成立了自治领，英属印度则被分裂成两个部分，而印巴这两个自治领也正式开始实行自己的统治。随后，英国正式撤走留在原印度领土范围内的所有驻军，英属印度恢复独立。1950年，分治后的印度首先宣布成为独立共和国。紧接着在1956年，巴基斯坦也宣布共和国成立。两国同时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在印度以印度教民族和印度教占有主导地位，兼有多民族和多宗教；而在巴基斯坦则以穆斯林民族和伊斯兰教为主导，兼有其它多民族和多宗教。宗教贯穿了从古印度到后来印巴两国建国的历史发展过程，

也对构建了民族国家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从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以研究宗教在印巴两国民族构建中的作用为主线，采用了文献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式，在比较分析印度教对印度建国的作用和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建国的作用后，论证了宗教在印巴两国民族构建的作用差异。本文发现，对印度而言，印度教的包容性推动了印度的世俗化合现代化进程，印度教成为了利益集团用来煽动民族情绪的政治工具，同时也被用来构建印度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对巴基斯坦而言，伊斯兰教则奠定了巴基斯坦的立国基础和政治民族身份认同，逐渐主导了巴基斯坦的政治，同时还引发了宗教认同大于民族认同，深化了极端主义。

通过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民族国家构建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宗教是两个国家构建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但是两国存在较为明显的凝聚力差异；宗教思想分别引领了两国的政党纲领和国家政策，但总体来讲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度有所不同；同时宗教虽然强化了各个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但也存在着程度上的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 厄内斯特·盖纳尔. 2002. 《民族与民族主义》.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和红梅·周月. 2017. “印度教的历史演进与派别之争.” 南亚东南亚研究, 3, 142.
- 和红梅. 2018. “缅甸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缅甸罗兴伽难民问题.” 世界民族, 3, 40.
- 胡祥云. 1998. “宗教的社会功用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探.”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3, 3.
- 姜景奎. 2003. “一论中世纪印度教帕克蒂运动.” 南亚研究, 2, 74.
- 姜景奎. 2005. “印度宗教的分期问题.” 南亚研究, 1, 61.
- 林承节. 2004. 《印度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刘海峰. 2006. “浅论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途径和方式.”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3, 20.
- 迈克尔·赫克特. 2012. 《遏制民族主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欧东明. 2004. “近代印度的宗教民族主义——以提拉克和甘地为例.” 南亚研究 季刊, 1, 82.
- 钱雪梅. 2008. “乌玛: 观念与实践.” 国际政治研究, 4, 105.
- 邱永辉. 2009. 《印度宗教多元文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孙晶. 2013. 《印度吠檀多哲学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田文林. 2009. “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国家建构过程——以后殖民时代的阿拉伯国家为例.” 世界民族, 3, 1-11.
- 汪长明·傅菊辉. 2011. “巴基斯坦建国理念的历史考察.” 学术探索, 3, 34-41.
- 王安琪. 1984. “古代印度并非统一的国家.” 学习与思考, 4, 28-29.
- 王联. 2017. 《世界民族主义史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肖珺. 2016.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 连接、信任与认同.” 学术研究, 11, 45.
- 杨洪贵·付玉冰. 2018. “1953年巴基斯坦反艾哈迈迪亚派运动.” 东南亚南亚研究, 2, 48-50.
- 俞可平. 1997.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 战略与管理, 1, 88-96.
- Abdul Ruff. 2017. “India’s Linguistic Imperialism: Tamil Nadu Resents Central Imposition of Hindi on Them!” *Kashmir Watch*.

- Ahmad Aziz. 1970. *Islamic Modernism in India and Pakist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59.
- Ajaz Ashraf. 2018. "How RSS Icon MS Golwalkar Misrepresented Nehru's Words to Justify the Hindutva Project of Ghar Wapsi." *Scroll*.
- Alfred Stepan. 2008. "Comparative Theory and Political Practice: Do We Need a 'State-Nation' Model as Well as a 'Nation-State' Model?."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3, No. 1, pp. 1-25.
- Angadi Ranga Reddy. 2009. *Gandhi and Globalisation*.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 p. 372.
- Aparna Pande. 2011. *Explaining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Escaping India*. UK: Routledge, p. 86.
- Asaf Hussain. 1976. "Elit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akistan." *The Developing Economics*. Vol. 14, No.3, pp. 224-238.
- Christophe Jaffrelot. 2016. *Pakistan at the Crossroads: Domestic Dynamics and External Pressur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307.
- Christophe Jaffrelot. 2007. *Hindu Nationalism: A Rea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100.
- Donald Eugene Smith. 1963. *India as A Secular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471.
-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1951. "Statistical Report on General Elections." *1951 to The First Lok Sabha*. Vol. 1, pp. 41-76.
- Hafeez Malik. 1993. *Dilemma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 138.
- Jamil ud-Din Ahmad. 1985. "Speeches and Writing of Mr. Jinnah." Vol. 1, No. 4, pp. 160-162.
- Joel Carmichael. 1957. "Islam and Arab Nationalism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Middle Eastern Politics." *Commentary*.
- John Kaye, George Bruce Malleson. 2010. *Kaye's and Malleson's*

- History of the Indian Mutiny of 1857-8*.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60.
- Karl J. Schmidt. 2015. *An Atlas and Survey of South Asian History*. UK: Routledge, p. 16.
- Leonard Binder. 1963.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1961.
- M. G. Chitkara. 2004.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National Upsurge*. India: APH Publishing, p. 16.
- M. Rashiduzzaman. 1970.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Pakistan Under the 1962 Constitu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42, No. 4, pp. 481-483.
- Mazhar Kibriya. 1999. *Gandhi and Indian Freedom Struggle*. India: APH Publishing, p.182.
- Mohammad Amir Rana. *The Seeds of Terrorism*. UK: New Millennium.
- Muhammad Iqbal. 2019. "Islamizing the Constitution of Pakistan: The Role of Maulana Maudoodi." *Al-Idah*. Vol. 27, No. 4, pp. 61-64.
- Myron Weiner. 1990. *Party Politics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83.
- Nathan McGovern. 2018. *The Snake and the Mongoose: The Emergence of Identity in Early Indian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4.
- Prabhu Bapu. 2013. *Hindu Mahasabha in Colonial North India, 1915-1930: Constructing Nation and History*. UK: Routledge, p.16.
- Pradeep P. Barua. 1994. "Military Developments in India, 1750-1850."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58, No. 4, pp. 600-602.
- Raj Pruthi. 2004. *Prehistory and Harappan Civilization*. New Delhi: Vedams eBooks, pp. 125-127.
- Richard Symonds. 1987. *The Making of Pakistan*, London. Pakistan: Islamic Book Service, p. 74.
- Rinchen Norbu Wangchuk. 2019. "Potti Sriramulu: Little-Known

- Freedom Fighter Who Sacrificed His Life for Andhra!." *The Better Home*.
- S. Gopal, Uma Iyengar. 2003.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Jawaharlal Nehru." p. 173.
- Sreeram S. Chaulia. 2002. "BJP,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ealist Alternative' to the Nehruvian Tradi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9, No.3, p. 220.
- Suneera Kapoor, Sri Aurobindo Ghosh and Bal Gangadhar Tilak. 1991. *The Spirit of Freedom*. Delhi: Deep & Deep Publications, pp. 55-71.
- Veeraswamy Krishnaraj. 2002. *The Bhagavad-Gita*. Indiana: iUniverse, p. 170.
- Yasmin Saikia, M. Raisur Rahman. 2019.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yyid Ahmad K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91.
- "Pakistan : History." Website of The Commonwealth, <https://thecommonwealth.org/our-member-countries/pakistan/history> (Search date: 2021/05/18).

투고일 : 2021년 8월 28일 . 심사일 : 2021년 9월 24일 . 게재확정일 : 2021년 9월 28일

* He, Hongmei is a Deputy Director(Executive Director), Institute of Bangladesh Studies.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South Asian Studies.

* Jin Shi is a Master of Statist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Lecturer, School of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Yunnan Land and Resources Vocational College, Research direction: Applied Statistics.

* Jia, Lu is a Master of Trade, Dong-A University, Doctoral student in Global Trade & Finance Studies, Dong-A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export of new energy sources.

<Abstract>

Danc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igions' roles in the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He, Hongmei
Shi, Jin
Jia, Lu
(Dong-A University)

The Indian peninsula is the region with the longest religious history in the world. Religion runs throug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ancient India to British India, and then to the partition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ith the booming of national movement for emancipation, coupled with British India suffering from intensified confrontation between hindus and muslims, suzerain Britain introduced the 'Mountbatten Plan' to admit Muslim to establish a separated regime, which ultimately l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a nation-state in 1950, and the formation of Pakistan followed in 1956. Religious facto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politics, economy and so 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Hinduism's role in the founding of India and that of Islam in the founding of Pakistan, this paper demonstrat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religions' roles in India and Pakistan. As a result, this paper found that religions were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both India and Pakistan to build a nation-state, bu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cohesion. Religious thoughts have influenced the national policies and administrative program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different degrees. Religions also more or less have strengthened the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each ethnic group in the two countries.

Keywords : Religion, India, Pakistan, Ind-Pak partition, Nation state construction